

社會科學叢書

何炳松 劉秉麟主編

歷史學派經濟學

朱謙之著

62763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 習 科 學 叢 書

何炳松劉秉麟主編

朱謙之著

歷史學派經濟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再版

(一〇一〇九)

社會科學叢書 歷史學派經濟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朱謙之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印翻
所有必究



四八九〇

本書校對者 廖秉全 程德全

序

法人孔德氏說人類進化，分爲神學，玄學與科學的三級；近代學者，無不以由玄學而嬗於科學爲目的，是我們所能公認的。科學的異於玄學，就是舍演繹法而用歸納法。但同是用歸納法的科學，因對象的不同，而得區爲兩類；一是自然科學，一是歷史科學，前者在剔除歧異之影響而求得反復不變的因果；後者在觀察類似之事實，而表出特別不同的關係。各有領域，不能相易。經濟學的成立，實始於古典學派，此派純用演繹法，以個人的利己性與自由競爭爲出發點，欲求得一抽象的超時間空間而永久不變的原則，以應用於一切；是貌爲襲用自然科學的法則，而結果乃蹈玄學的覆轍。馬克思派反之，乃參用歸納法，而又欲執著階級鬭爭的理論以建立一成不變的公則，乃不得不利用黑格兒的辨證法以爲護符，於是又成爲半科學半玄學的組織。純粹用歸納法的，惟有歷史學派。歷史學派中，雖也有新舊的區別，而且經濟學中是否由國民經濟學而進於世界經濟學，亦

爲值得研究的問題；然而歷史學派的經濟學，確比古典學派與馬克思學派爲進步，是無可疑的。我國經濟學說，雖自管子時代，已有甚精的格言，然二千年來，迄未有科學的組織。直至十九世紀，始有侯官嚴氏所譯之斯密氏原富，是屬於古典學派的。最近時期，又有譯述馬克思派的著作，然亦零星小著，無關宏旨。至於純粹歷史學派的著作，則譯者較少。朱君謙之，素治玄學，著有虛無哲學等書；近則由玄學而進於科學，於歷史學派的經濟學，研究甚深；特編此書，不特於歷史學派與古典學派及馬克思派的異同，分析甚精；而且於歷史學派中各種經濟發達階段說，詳悉敘述而加以批評，於我國經濟學界，必有重要的裨益，可以斷言。所以略誌緣起，藉爲介紹。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蔡元培。

目 錄

蔡子民先生序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歷史學派的根本觀念	14
第三章 歷史學派的國民經濟學	50
第四章 歷史學派的經濟發達階段說	90
第一節 評 <u>馬克思</u> 派經濟階段底理論	90
第二節 經濟發達階段說的性質	110
第三節 經濟階段說的分類	163
第四節 <u>李士特</u> 的經濟發達階段說	170
第五節 <u>格洛士</u> 的經濟發達階段說	184
第六節 <u>羅協兒</u> 的經濟發達階段說	192
第七節 <u>希德布蘭</u> 的經濟發達階段說	198
第八節 <u>畢喜兒</u> 的經濟發達階段說	219
第九節 <u>石慕勒</u> 的經濟發達階段說	270
第十節 <u>桑巴德</u> 的經濟發達階段說	279
第十一節 經濟階段的心理化說	291
第五章 歷史學派批評的批評	314

歷史學派經濟學

第一章

緒論

歷史學派 (Historical School) 是近代一羣重要學者，應用歷史精神和方法到社會科學上的一個新運動。不但經濟學史上有歷史學派，政治學上法律學上也有歷史學派。如葛退爾 (Gettell) 在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中，即有“政治思想的歷史學派”一章，歷舉德國歷史學派的薩維尼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英國歷史學派的梅茵 (Sir Henry Maine)，美國歷史學派的柏哲士 (John W. Burgess)；實際直到現在，根據於歷史的考察來研究政治和法律發展的學者，

恐怕比從前還要佔勢力吧！奧彭衡 (Oppenheimer) 雖反對新歷史學派，而他所著的國家論，卻完全引用歷史方法來講明國家制度的發達。法律學上的新歷史派即社會學派 (Sociological School)，也有代表人物。如 Erhlich, Holmes, Pound, Cardozo 等，可算法律學幾大宗派中最大的一派。可見從廣義來說，歷史學派的運動，在多數學者努力之中，是沒有間斷過來的。不但如此，現在最出風頭的，不就是馬克思派？馬克思 (Marx) 不是做過“歷史法學派之哲學的宣言”來反對歷史學派之淺薄傾向？（改造社版馬克思·燕格兒全集頁 195-200）然而很奇怪的，當他批評歷史學派最利害的時候，即他最受這一派影響的時候。他那篇論文極力批評歷史學派的元祖韋柯 (Vico)，而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節的腳註，又那樣地注意他。（他的女婿拉發格 (Paul Lafargue) 著“正義·神靈的唯物史觀”第一章馬克思的歷史方法，第三節即專論韋柯的歷史法則，可見影響之大了）。而且我們即就馬克思所說“經濟的社會構成之進步的階段”，即概括之為“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市民的生

產方法”的發達階段；似此應用的歷史的觀察，來建立經濟發達階段的法則，和歷史學派的經濟階段說，還有什麼不同？歷史學派誰也知道他是受黑格兒（Hegel）哲學的影響很大，但馬克思學說，亦何能跳出此例。可見馬克思派雖反對歷史學派，實際上他也正是一個歷史學派的產物，的確確是一個歷史學派的學者。他的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在一八四八年，和歷史學派三大建設者之一人希德布蘭（Hildebrand）的“現在及將來的國民經濟學”同年發表，這不就很明顯很可注意的事實吧！所以我們現在經濟學的問題，不要像從前那樣徬徨不定，我們很可以把問題縮小，來問一問我們是要遵循歷史學派當中的那一派？馬克思一派，還是李士特（List）一派？還是希德布蘭一派？還是……？這麼一來，歷史學派的討論範圍就擴大起來了，然而我這一本小書，初意並不準備將馬克思派立即加入，所以這裏也只表過不提。本書的最大目的，只要能夠簡簡單單地講明研究經濟學上的歷史學派，即十九世紀中葉德國的歷史學派就完了。

原來德國歷史學派，在思想方面是對抗第十八世紀斯密亞當(Adam Smith)李加圖(Ricardo)等基於演繹法所成絕對主義的英國古典派經濟學，而主張歸納的相對主義的歷史方法。但這歷史方法，據許多學者都說是受了黑格兒主義(Hegelianism)的影響。韓訥(Haney)的經濟思想史和葛退爾(Gettell)的近代政治思想史，差不多有同樣的論調。據我看來，黑格兒(Hegel)哲學在德國當時實已鑄成了純粹的德國社會學的形態，所以德國社會科學的創設者，無論是馬克思，燕格兒(Engels)，抑為經濟學家而兼政治學家的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 1855-1888)，他們幾位都是引用黑格兒學說於經濟學方面去的。(參看加田哲二著近世社會學成立史頁206)馬克思不要說了，尤其是施泰因，承認經濟學與歷史觀念相關聯，實為德國從古典主義過渡到歷史經濟學派的一大思想家，他的社會政策的理論，也實為後來石慕勒(Schmoller)所本。過此便是那一位歷史學派經濟學家的羅協兒(Roscher)，他所受黑格兒主義的影響，更為顯明。總之黑格兒據斯班(Spann)和威瑟(Wiese)告訴

我們，他是德國社會學的開山元祖，比康德 (Kant) 菲希特 (Fichte) 的貢獻還要重要些，所以我們假說歷史學派爲黑格兒主義方面的發展，也實在有充分理由。何則？黑格兒主義影響於歷史經濟學派者，有可注意的兩要點：第一是“進化的方法，”據費雪 (Kuno Fischer) 對於“黑格兒哲學解說”（原著見近世哲學史的第八卷，坂上絢一郎譯，黑格兒哲學解說頁 1—15）則黑格兒的出發點，即爲世界發展又世界全現象，尤其生活全現象的進化觀念。不消說這種特出的進化思想，給歷史學派以一大刺激，使他知道經濟生活是一種與時代共同進化的連續，牠是不斷的創造，又能進步的；因此而古典學派的絕對主義便推翻了。第二是“歷史的方法，”我們讀過黑格兒“歷史哲學”的，不能不承認他是已經貢獻了劃時代的歷史的方法，對於一切社會科學的諸形像，如國家，法律，宗教乃至人生的諸領域，都能從歷史的過程形態去觀察他。一面具體的認識那些事象過去的軌道即一面預測現實的必然的歷史的步驟，這種特出的歷史的思惟的考察法，一轉便可應用於經濟學，成功爲經濟

之歷史的考察法（歷史學派），與歷史之經濟的考察法（馬克思派），於是而種種經濟發達階段說發生，而古典派的抽象演繹法，便應手倒下來了。由上可見歷史學派實淵源於黑格兒主義的方法，在黑格兒本身生前雖沒有系統的發表過經濟學，〔“人倫的社會體系”(System der Sittlichkeit)乃是未完稿，並且很不明瞭似的。)而事實上歷史學派因為有可靠的進化的歷史方法做根據，便成就了比黑格兒還要進步許多的經濟學說。就是馬克思走錯了路似的，想用黑格兒辯證法組成經濟的理想，（最好笑的是他們的財產的辯證法，自相矛盾。如馬克思以私有財產為肯定的階段，黑格兒則以共有財產為肯定的階段，那末叫我們後學要如何適從？怪不得克魯泡特金(Kropotkin)要大呼打倒辯證法了。)然而他的成就已經是青出於藍，不過比較於歷史學派，則馬克思派未免玄學的色彩太多，而後者的優點，則更接近自然科學的方法罷了。

但從另一方面看，則歷史學派雖受黑格兒哲學的影響，卻不止單受黑格兒哲學的影響的。在這裏我可以依

據殷格郎(Ingram)著“經濟學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萬有文庫內胡澤許炳漢譯)第六章“歷史學派”(第三冊頁23—85)的幾段話，知道除了黑格兒以外，歷史學派實受孔德(Comte)的影響最大。“據孔德觀察，社會學的主要點，當如下述：——(一)社會學一定是一種科學。在此科學裏面，凡社會狀況的一切要素及其彼此的關係，和交互的動作，統通要研究的。(二)社會學包含動態的和靜態的社會學說。(三)社會學排斥絕對論，以循序變化的概念，代替抽象固定的概念。(四)社會學雖不排除其他講學法，卻是牠的主要方法，是歷史比較法。(五)社會學充滿了道德觀念和社會責任思想，與從〔天則〕(Jus naturae)論所推演的個人權利相反。(六)社會學的精神及其實行結果，都趨於實現一切構成〔公共正義〕(Popular cause)的大目的。(七)社會學雖以此爲目的，卻是企圖實現，是利用和平的方法，以進化代替革命。”(頁三十三)這上述各種特點，可說和德國歷史學派的全部學說完全一致，尤其是關於社會動態的研究；孔德派承認“社會學自有，而

且必須有牠的研究範圍，和特殊的研究法，牠的範圍即是最廣的歷史範圍，包含同時代的事實，而牠的主要研究法，——雖不是唯一的研究法，——如我們說過的，即是社會學之比較法，最適當的稱之爲〔歷史法〕(historical method)”(頁三十五)。將這種歷史法適用於經濟學，便就是歷史學派的見解。不但如此，孔德在他的實證哲學以及他的實證政治學(Politique Positive)的許多地方，對於從前經濟學者的一般觀念和研究法，都提出或暗示反對，特別是對於我們所說的李加圖及其黨徒的觀念和方法，予以非難。約翰穆勒(J. S. Mill)曾對孔氏的評語發生憤怒，說“此種評語，實足以見孔德之如何淺薄；”(頁三十七)由這憤語，可見孔德和古典派經濟學者是怎樣衝突。不過問題卻有一點，就是孔德思想雖如何接近歷史學派，而歷史學派事實上還不肯老實承認是受他的影響，如克尼斯(Knies)就是好例。他所著“站在歷史方法立場上的經濟學，”依殷格郎的批評，“他對於歷史法之解說和闡發，於孔德之所成就者毫無增益，氏書的第二版刊行於一八八三年，在此版

裏面，他作一個奇怪的聲明，說當他在一八五二年撰著此書的時候，對於這種由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二年就已出版六集的實證哲學，他完全不知道，並且他又說，或許所有德國經濟學者，都不知道。這種說法，頗於他們心地的光明上，或是文字的縝密上，發生疑問的。設若我們記得穆勒在一八四一年已經與孔德通信的事，和一八四三年出世的邏輯學 (Logic) 裏頭穆勒稱頌孔德的話。可是，克尼斯嗣後研究孔德的作品時，他告訴我們說，他在此書中發現這樣多與他的結論相同的意見，令他驚詫不已。他或許是很驚詫，因為他的方法論中真正有價值的見解，而被孔德說來，則規模較大，魄力亦較雄厚了。”(頁四十二)其實不但克尼斯如此，最明顯的如希德布蘭，他關於改良經濟學所立的目標，不受歷史派法律學的感動，而是受言語學的感動。迪爾 (Karl Diehl) 在他的 Theoretische Nationalökonomie 頁 213 (此據住谷悅治經濟學說的歷史性階級性頁一四 §1) 說，“不管羅協兒用歷史法律學的方法，希德布蘭卻以歷史的言語學為依據。” (Wie Roscher die historische Juristenschule

So hat Bruno Hildebrand die histor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als Vorbild genommen) 這樣兩種根據的不同，即無異告訴我們，黑格兒主義與孔德主義的不同。因為十九世紀言語學的進步證實了人類言語是經歷史上秩序的變化，以成現今的言語，經濟生活，同樣地亦經過歷史上秩序的變化而演成現代的經濟生活。因此希德布蘭遂採用言語學的道理，而應用於經濟學，結果在經濟研究上，也主張以相對觀念，代替了絕對觀念。我們再轉眼看希德布蘭“現在及將來的國民經濟學，”有對於蒲魯東(Proudhon)財產論的有名的敘述，(頁239—256，在許多蒲魯東研究者如 Salomon, Zenker, Dube, Mülberger 中，他也是應首屈一指的。)然而蒲魯東和孔德是有思想上的關係，(只要注意在一八五七年九月八日舉行孔德葬式時，蒲魯東是在許多參列者之中，就很夠證明他們是同調的了。)那末希德布蘭能說沒有間接受着影響罷！總而言之，歷史學派實兼受黑格兒與孔德兩大導師的影響，可說就是這大思想的一個綜合。他們的優點，是在有這兩大思想的長處，而捨棄了他們短

處，這一點拿來和馬克思派比較，似乎又勝着一籌的了。

於是從歷史學派思想的背景，移到研究當時發生的社會背景時，最喚起我們注意的，是按那時德國的情形，和中國現時情形，差不許多。一八三三年的關稅同盟，可算歷史學派元祖李士特 (List) 根據各國歷史事實，提倡保護關稅論的成功；然而細察那時情形，和在次殖民地的中國，因受國際的經濟壓迫，以致八十年來農業衰落，工業凋零，民生憔悴，國勢衰弱，一直弄到如今纔主張保護政策，而有所謂關稅運動與裁釐運動發生，這不是和李士特的學說背景，恰恰相同的嗎？我最好在這裏把馬寅初先生“馬克斯學說與李士特學說二者孰宜於中國？”一文（見馬寅初演講集第一集）所述德國當時的社會背景，摘錄其條目如下：

- （一）內地稅之遍設；
- （二）國境關稅之廢滯；
- （三）企業家之要求；
- （四）商務上之統一。